切尔诺贝利事件所反映出的真实苏联政策体制---从失败的信息传递作讨论

吴晨聪, wucc22@mails.tsinghua.edu.cn

1. 缘起与“谜题”

这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23分47秒于乌克兰北部的小城市普里皮亚季中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核泄漏事件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为控制此次事件，苏联政府作出了当下他们认为「最好的」的应急方案，但从现在的角度回看，无论在信息传递、灾难措施及后续处理等方面，当时的应急方案都无疑是一次失败政治决策。而对于一场事故而言，信息的掌握绝对是重中之中，政府官方需要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人民群众也有必要知悉事件的完整。但令人倍感惊愕的是，苏联这个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在信息传递上的处理可谓是一塌糊涂，不仅是群众，就连政府对事件的了解也是在云里雾里，后知后觉。站在群众的角度，迫切想知晓事件的真相是合乎情理的，但为何先前不断要求苏联政府公开情报的民众在情报公开后却对政府感到唾弃呢，他们仅仅是对苏联在事件上的处理不当而感到不满吗？很显然，苏联群众的眼睛十分明慧，他们看到的不只是当时切尔诺贝利事件失败的应急方案，而是背后决定出此次应急方案的那套政治体系。本文将以苏联针对切尔诺贝利事件所制定的应急方案中的信息传递部分作讨论，从苏联政府及人民群众两个角度出发，真实还原两方在事件中的信息掌握情况，挖掘其背后反映出的真实苏联政策体制，令读者充分了解当时苏联在各方面政策体制上的缺陷，反思且吸收这段历史，同时为理解后来苏联解体提供一定思路。

1. 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

对于一场灾难事故而言，不论是初期灾情报道、中期救援报道还是后期总结报道，信息传递都是充满价值和意义的重要一环。[[1]](#footnote-1)但就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政府种种迷惑的措施以及国民群众激动的声音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环”出现了极为明显的缺口。以下两小节将会分别站在苏联政府及国民群众两个视角，探究两方当时在信息传递上的具体情况。

（一）苏联政府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对信息的掌握

对政府而言，时刻掌握事件的第一手信息是必要的。每一个成熟的应急管理方案都需要拥有一个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领导者。[[2]](#footnote-2)因此，在一次突发事故中，政府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而如何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前线信息的了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依据。

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政府的官方信息传递渠道有明显缺陷。

第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四号动力机组发生事故后，事故信息是通过多个传输通道到达莫斯科的[[3]](#footnote-3),这导致了事件信息的不统一,令莫斯科对事件的了解十分模糊。当时莫斯科收到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结论近乎统一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场发生了爆炸，引起了火灾，但目前情况已得到了控制。”，而对于事故的发生时间、发生过程和反应堆状态等的详细情况，各单位的报告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描述，或者根本没有在报告中提及。

第二，即便苏联官方在得知事件的发生后，立刻组织人员去现场进行勘察，但所带回的零碎信息，无法让莫斯科真正知悉事件的严重程度。在事发后,一个名为“处理切尔诺贝利事件政府临时委员会”成立了，但基于不重视的态度以及团队人员的缺乏，所带回莫斯科的都只是基于表面状况且带着各种保留条件的描述，迟迟未能上交一份正式的情况说明书。[[4]](#footnote-4)

第三,在莫斯科的内部，苏联的高级管理层也未能及时了解事故。根据戈尔巴乔夫的一段回忆: “有关这个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己是26日清晨，是通过中型机器制造部的专线电话传送的。先报告给雷日科夫，他又通知了我。当天我召集政治局委员，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林作了通报。他宣布这个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同时，不少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层成员都没有实时收到核电场爆炸的消息，如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和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沃罗特尼科夫分别回忆起他们是在28日和27日才对事件略有耳闻，且也只是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场发生了爆炸。[[5]](#footnote-5)

灾后信息不统一，调查信息不严谨，内部信息不流通，这些都映射出了苏联政府在官方信息传递体制上存在巨大问题，导致无法做到时刻掌握事件的第一手信息。而正是这些信息传递上的问题造成了苏联官方无法做出良好的判断,以至于制定的应急方案一直被后人所垢病。

（二）人民群众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对信息的掌握

对人民群众而言，渴望知悉事件的完整是合理的。对于有关人类存活和安全类的信息是人们最基本的信息需求,[[6]](#footnote-6)而在一次公共危机发生时，公众寻求信息,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尤为强烈。[[7]](#footnote-7)因此,处于事件中心的苏联群众有权利了解切尔诺贝利事件。

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国民群众无法获知事件的真相。

第一,对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消息，官方选择隐瞒式报道。28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议会上,戈尔巴乔夫在与成员商论过后,决定要对群众公开切尔诺贝利事件,但考虑到避免出现恐慌现象和公众反对核电站的情绪,以及防止国际出现对苏核设备的负面评论,因此,信息文本内容应当 “写得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不安和慌乱”。基于上述考虑,国民所接收到的信息和事发之初莫斯科收到的信息类同，除了对外证实切尔诺贝利核电场发生了事故外，并没有其他实质性内容,甚至未指出事故的时间和人员伤亡情况。

第二,国民收到的只是具有安抚性质和保守至极的消息。即使民间和国际都对苏联施以压力,要求苏联公开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详细内容,包括辐射污染水平、辐射扩散方向等等,而苏联也的确向世界公布了第二和第三份信息文本，但令人失望的是,两份新文本的内容也都是片面、模糊的，与其说是想作对事件的说明, 更像是在安抚信息受众。而为了不让国民感到恐慌, 普里皮亚季地方政府甚至还坚持在事故地举办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试图利用节日的愉快气氛向国民掩盖事件的严重性,[[8]](#footnote-8)在事件过去后快一周的时间,苏联的许多国民因信息的不透明,仍未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次史诗级的灾难。

苏联政府对事件信息的隐瞒和发布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消息,都令苏联国民无法得知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完整。在一场灾难事故中,群体对信息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自然会感到恐慌,更加会令公开消息的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甚至失去该有的公信力。

1. 谜题分析

从以上两小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无论是在对内消息传递或是对外媒体传播皆存在了巨大的问题。而这两方面的问题造成了苏联针对切尔诺贝利事件应急管理方案制订的失败以及让国民失去了对政府的信心。而这种种都是一种表面现象，我们更该关注的是背后的内在本质，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发生？答案其实已经透过苏联群众的声音告诉我们了，当时苏联的体制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的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强国，其国家政治体制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事实上，一个政府在应对灾难事件时对信息传递的处理是能够有效反映出其政治体制的良好与否的。而切尔诺贝利事件作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灾难，苏联的应急管理方案也是公认的存在许多改善空间,

借由切尔诺贝利事件对苏联临近解体前的政治体制进行进行深究，能够让读者了解历史真相，可以引起批判性思考,同時也能为理解当世政局提供参考。在当前已存在不少对于苏联体制以及切尔诺贝利事件的权威研究，但鲜少有学者针对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应急管理的信息传递部分作苏联政治体制的讨论。下文的内容将会透过上一章中所提及到的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苏联政府和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现象，去探讨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的本质。

1. 初稿写作规划（选做）

不知道拟稿写得怎么样，所以也不太敢對初稿動筆,害怕要大改…

內部信息傳遞反映的體制:800字

外部信息傳播反映的體制:800字

總結:400字

1. 雷蔚真,胡雅婷:《从CNN海地地震报道看信息传递与价值重构》,中国记者, 2010年第1期 [↑](#footnote-ref-1)
2. 邹逸江: 《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启示》, 灾害学,2008年第1期 [↑](#footnote-ref-2)
3. Geist, Political Fallout: The Failur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t Chernobyl, Slavic Review, Vol. 74, No. 1 (Spring2015), pp. 104-126. [↑](#footnote-ref-3)
4. 张菊萍:《苏联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紧急应对 策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 [↑](#footnote-ref-4)
5.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述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footnote-ref-5)
6. 沃纳 • 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福建：福建国民出版社，1985年:285页。 [↑](#footnote-ref-6)
7. 赵路平:《公共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公众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2007年。 [↑](#footnote-ref-7)
8. 李军刚,李飞跃:《苏联体制与苏联社会:现象与反思——以《切尔诺贝利》为切入》, 牡丹江大学学报, 第29卷第3期, 2020年3月。 [↑](#footnote-ref-8)